

在連串社會運動下青少年社會意識形態及其背後因素的比較研究：香港與澳門^{1,2}

陳嘉賢³

摘要：近年來香港發生了多起大規模社會運動，在這些社會運動中青少年成為主力軍。與之相比，這樣的社會運動在澳門青少年中卻沒有多少市場，這體現了兩地青少年在社會意識形態上的巨大差異。本文希望分析和比較兩地在社會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並探索背後的原因。

關鍵詞：香港、澳門、青少年、社會運動、意識形態

1 本文目的在於“持平”分析和比較香港與澳門青少年的社會意識形態及其背後的因素，聚焦當中的事實現象的存在。本文盡量對任何意識形態、傾向、取向或“政治正確性”不作任何贊同或否定，亦竭力堅持不對它們作任何對、錯、高、低的定性，以資持平，亦不致使本文失去原有的說服力。

2 香港與澳門一般被民間習慣簡稱為“港、澳”，故本文行文時次序依此習慣，即香港先於澳門，這並不意味着港、澳之間有高、低、輕、重之分。

3 陳嘉賢：澳門理工學院教授。Email: victorkayinchan@gmail.com

近年來香港發生了不少大規模的社會運動，較為矚目的有 2014 年“佔領中環”（或簡稱“佔中”或俗稱“雨傘”）運動(Hung, 2018)和橫跨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或簡稱“反修例”或俗稱“反送中”）運動，還有林林總總的其他社會運動，有的在街頭，有的在議會(Chong, 2018; Wong and Tang, 2017)。反之，地理上接近和社會制度上類似的澳門大致不為其所動，上述運動沒有蔓延至澳門，甚至說它們在澳門根本沒有多大“市場”(Sheng, 2019)，充其量澳門多年來只發生過零星輕微而且短暫的社會事故(Chong, 2018; 蔡永君, 2013)。這不禁令旁人聯想到港、澳兩地之間，或許存在社會意識形態的一定程度差異，本文試圖分析和比較兩地的社會意識形態及其背後因素，而且聚焦於活躍參與上述社會運動的青少年年齡層(Wong and Tang, 2017)，鑑於當前研究還處於初步階段，以及本文只屬簡短論文，上述分析和比較主要是限於初步的文獻比對和綜述，以及綜合文獻作推論，期望可以作為日後進一步研究的基礎。然而，基於該等初步文獻比對和綜述，已經發現上述背後因素主要可以歸納為公民教育及其歷史背景、青少年自我感覺、議會的組成、社團管治文化和貧富懸殊五大範疇，下文就循該五大範疇逐一闡釋。

公民教育及其歷史背景

據許崇德(2018)分析，“香港人”的身份建構始於香港回歸祖國前幾十年，

許氏認為當年港英政府為了塑造其與親祖國人士的“彼此分明”，故建構了一個具有獨立性、異於內地“中國人”的“香港人”身份，同時營造“香港是我家”的本土意識以爭取香港居民的支持，香港居民相對內地“中國人”的優越感也逐步形成。姑勿論許氏的分析是否完全正確，沒太多香港居民會否認幾十年以來，不論是回歸前或後，香港居民的主流自我形象標榜有異於和優越於內地“中國人”，該主流自我形象在香港各界也深入人心，包括目前相當比例正在教育青少年的老師，以及青少年的父母/家長。

在這背景下，即使時至近年，香港學校的道德、公民和國民教育僅略略提及諸如“國民身份”和《基本法》的課題，例如對祖國的文化、地理、歷史等的欣賞和認識則更加幾乎完全欠奉(*Moral, Civic and National Education*, n.d.)。事實上，香港典型的公民教育包括學校集會和課外活動，過程中涉獵的公民概念主要有例如法治、民主、人權、香港的社會發展(Chong, 2018)，“國民身份”和認識祖國等並沒有被重點突顯。而且鑑於上述背景，任何相關的改革亦困難重重，在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曾經嘗試引入全新的國民和道德教育課程，卻遇上大量學生、家長和教師的聯合反對而要擱置(Chong, 2018)。加上，於2009年，在香港中學高年級引入了通識科目作為其中一個核心科目，該科目強調多角度思考和批判思考，間接激發了青少年的抗議、不滿和要求的文化(Chong, 2018)。

相反，在 1966 年發生“一二·三事件”之後，澳門的部分事實“行政/管治權”已經由當時的澳葡政府“移交”給了本地親祖國的協會、工會和商會等，可以想像效果相當於是，就包括本地教育在內的部分社會範疇實行了放任自由政策(Hao, 2011)。該等親祖國團體所關聯的學校一直所採用的公民和國民教育一般理所當然是突顯了認同“國民身份”和認識祖國(Chong, 2018)。時至今日，澳門的公民教育被認為是近似基於法律規範的道德教育，培養所需的公民(Chong, 2018; Hung, 2018)，並強調保持現狀和服從，不強調公民行動(Chong, 2018)，當然亦突出“愛國愛澳”、“弘揚國家與特區”、“立足澳門，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黃素君, 2008)。

上述解釋了香港青少年認同“國民身份”和認識祖國的水平不及澳門青少年的前因後果。

青少年自我感覺

根據香港城市大學的研究，發現香港中、小學生和一般青少年的自我感覺明顯高於西方主要國家的相應群組(Leung, 2013)，更可能冠絕全球。事實上，該研究是針對“自戀”(narcissism)，而並非“自我感覺”，可是由於“自戀”一詞或許略帶貶意，可能有違本文開宗明義強調的持平和不作定性的堅持，故文中主要採用“自我感覺”一詞代之。然而，撇開詞彙的持平化，根據在美國和丹麥的研

究(Fazekas and Hatemi, 2020), 高“自戀”程度與高政治參與程度相關, 這包括高的請願、遊行、示威等參與度, 難怪香港青少年如此熱衷於請願、遊行、示威等和相關的社會或政治運動, 對其一直孜孜不倦。反之, 到目前為止沒有證據顯示, 澳門青少年有類似的自我感覺水平, 故可以部分解釋港、澳青少年就請願、遊行、示威等和相關社會或政治運動的社會意識形態所存在的差別。話雖如此, 為進一步證實該解釋, 筆者建議稍後在澳門也同樣進行一次有關其青少年“自戀”程度的科學化普查, 以資印證。

議會的組成

無論是在回歸祖國之前或是在回歸後的相當部份時間, 香港的立法會(回歸前稱之為立法局) 議員在名額上相對較為由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主導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Members' Biographies*, n.d.), 澳門者則相對較為偏重商界人士和企業家(蔡永君, 2013)。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的議員傾向作“為民請命”的“啄頭”, 甚至鼓動, 來挑戰政府行政當局, 以務求最大程度地提高以後選舉中的政治知名度, 箇中邏輯確實可以理解的, 反觀, 商界人士和企業家要考慮到在政府各種潛在利益, 例如期望在政府中建立人脈以瞭解和預測當中的決策來協助自身的商業或企業發展、為自身的商業或企業爭取政府合同/牌照/土地使用權等, 故此他們一般相對較為親政府行政當局(或在香、澳的用語是“親建制”)。商界人士和企業家的該

等親政府行政當局取向並非澳門所獨有，而是在全世界範圍內普遍存在，即使在高度發達國家中也是如此，儘管這種取向有時可能以非常複雜的方式出現 (Useem, 1982)。這至少部分解釋了相對抗性的香港立法會與相對合作性的澳門立法會，港、澳兩地截然不同的立法會情勢和氣氛容易相應地感染了兩地的青少年，建立了分處兩地的他們甚為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前者訴諸對抗，包括跟政府行政當局抗爭，後者願意合作。尤其是，外國研究發現，即使在最發達的國家，商業和企業僱主的社會或政治意識形態對他們眾多僱員的相應意識形態也有着相當的影響(Hertel-Fernandez, 2016)，如果推斷澳門較為親政府行政當局而本身為商界人士和企業家的議員某程度上引導了其眾多僱員(包括青少年僱員)傾向類似其親政府行政當局的社會意識形態，那亦合乎外國的研究結論，反觀香港，本身為商界人士和企業家的議員比例偏低，上述對僱員影響的效應也相對偏低。

社團管治文化

辜麗霞(2005)歸納了社團在澳門社會的功能和作用如下：

人口只有 476,000 人，土地面積只有 27.3 平方公里的澳門，社團數目竟達 2,700 個，平均每 180 個人便組成一個社團，這種現狀確實為外人所不容易理解的。

無論是工商界別、教育界別、勞工界別的社團都為政府發揮協調的橋樑作用，使社會得以和諧穩定。

在經濟性公共事務方面，澳門社團為政府提供了諮詢功能，如澳門中華總商會、澳門建築置業商會、澳門廠商聯會、澳門出入口商會等。

其他團體如澳門中華教育會，向政府提供教育方面的意見，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協調勞資關係，保障工人的權益。

總括來說，幾乎獨一無二只存在澳門的社團管治文化，為本地社會分歧和衝突，以及其和解及共識提供了緩衝，促使任何社會分歧和衝突在升級為社會對抗之前，大多數都可以通過這些社團的調解與和解來解決。相反，香港沒有這個社團管治文化作為防火牆，加劇了港、澳兩地包括青少年在內的居民，在社會意識形態上分別相對較為傾向於對抗與和解。

貧富懸殊

儘管所有社會指標的有效性皆具爭議性，理應謹慎看待，但“家庭收入分配：基尼指數”衡量的是國家或經濟體中不同家庭之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表明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的不同家庭之間收入差距多麼不平等，指數越高，分佈越不均

等。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世界概況》(The World Factbook)⁴，在普查的 157 個國家或經濟體中，香港排在第 9 位，澳門排在第 97 位，即低於香港 82 位(*The World Factbook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d.*)。事實上，在名單上高於香港的國家或經濟體皆不是發達國家或經濟體。換句話說，香港在所有發達國家或經濟體的家庭收入不平等名單中名列前茅。而且，類似其他地方的情況，近年來的房地產泡沫擴大了貧富差距，皆因已經富裕的居民通常擁有物業，他們在近年受惠於物業增值，從而進一步在財富上拋離本身已經不多富裕而因而沒持有物業的族群(Wang et al., 2020)。正如 Hill and Montag (2015)所言，“由於財產不平等而引起的嫉妒導致了仇恨和破壞的循環.....”，Nolan and Valenzuela (2019)也得出類似結論，指不平等驅使“憤怒的反抗”和民粹主義的崛起，Dragolov et al. (2016)更加具體化謂不平等與對政府、跨國家機構和民主的低下信任度有關，Gould and Hijzen (2016)也發現不平等與對政府信任度的類似聯繫，由此推論，在一定比例的香港居民當中，包括青少年間，存在嫉妒、仇恨、憤怒和民粹主義，而且他們或許對政府缺乏應有的信任，甚至懷有破壞和反抗的情緒。相反，毫不奇怪，在家庭收入上被列為中等平均的澳門，其居民，包括其青少年，較少懷有上述心態、情緒和不信任，相互間更加和諧。這是港、澳青少年在社會意識形態

⁴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世界概況》(The World Factbook) 為互聯網上公開資料，可以任由任何公眾查閱，而並非任何機密“情報”。

上另一方面的差別，而且其背後因素基本跟在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的研究有一定程度的脗合。

參考文獻

- Chong, E. K. (2018). Nationalistic education in the Hong Kong and the Macao SARs of China. *As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7(4), 395-411. <https://doi.org/10.1108/AEDS-07-2017-0064>
- Dragolov, G., Ignácz, Z. S., Lorenz, J., Delhey, J., Boehnke, K., & Unzicker, K. (2016). *Social Cohesion in the Western World: What Holds Societies Together: Insights from the Social Cohesion Radar*.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32464-7>
- Fazekas, Z., & Hatemi, P. K. (2020). Narcissism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0146167220919212.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20919212>
- Gould, E. D., & Hijzen, A. (2016). *Growing apart, losing trust? The impact of inequality on social capital* (Working Paper No. 16/176).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16/12/31/Growing-Apart-Losing-Trust-The-Impact-of-Inequality-on-Social-Capital-44197>
- Hao, Z. (2011). *Macau History and Societ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Hertel-Fernandez, A. (2016). How employers recruit their workers into politics - And why political scientists should car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4(2), 410-421. <https://doi.org/10.1017/S1537592716000098>
- Hill, M., & Montag, W. (2015). *The Other Adam Sm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ng, C. F. S. (2018). Civic education policy of decolonization in Hong Kong and Macau: A documentary analysis. *Journal of US-China Public*

- Administration*, 15(1), 1-12.
<https://doi.org/10.17265/1548-6591/2018.01.001>
-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Members' Biographies*. (n.d.).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trieved November 26, 2020, from <https://www.legco.gov.hk/general/english/members/yr16-20/biographies.htm>
- Leung, M. (2013). *Hong Kong kids more narcissistic than Western kids according to CityU study*.
<https://www.cityu.edu.hk/media/news/2013/04/23/hong-kong-kids-more-narcissistic-western-kids-according-cityu-study>
- Moral, Civic and National Education*. (n.d.). Education Bureau of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Retrieved November 26, 2020, from <https://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index.html>
- Nolan, B., & Valenzuela, L. (2019). Ineq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35(3), 396-430.
<https://doi.org/10.1093/oxrep/grz016>
- Sheng, Y. (2019, July 26). Macao unaffected by HK violence. *Global Times*.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59333.shtml>
- The World Factbook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d.).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Retrieved November 27, 2020, from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172rank.html?>
- Useem, M. (1982). Classwide rationality in the politics of managers and directors of large corpo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7(2), 199-226.
<https://www.jstor.org/stable/2392300>
- Wang, Y., Li, Y., Huang, Y., Yi, C., & Ren, J. (2020). Housing wealth inequality in China: An urban-rural comparison. *Cities*, 96, 102428.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19.102428>
- Wong, W. W. H., & Tang, G. K. Y. (2017). Social movement and youth participation in Hong Kong: Importance of co-evolu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youth.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0(1), 96-112.
<http://csulb.idm.oclc.org/login?url=https://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

direct=true&db=psyh&AN=2018-20275-009&site=
ehost-live%0Awwong@cuhk.edu.hk

蔡永君. (2013). 從澳門立法會的利益代表看回歸後的社會運動. “一國兩制”研究, 16, 106-115.

許崇德. (2018). 「六七暴動」與「香港人」身份意識的萌生.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169, 77-94.

辜麗霞. (2005). 澳門的社團文化與公共政策. 行政, 18(70), 1249-1260.

黃素君. (2008). 回歸後澳門公民教育發展路向的檢視. 基礎教育學報, 17(2), 97-123.